



多学科视域下的 中国道路研究

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编

多学科视域下的 中国道路研究

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学科视域下的中国道路研究/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ISBN 978-7-208-15602-9

I. ①多… II. ①上…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89461 号

责任编辑 罗 俊

封面设计 零创意文化

多学科视域下的中国道路研究

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编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8
插 页 2
字 数 201,000
版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602-9/D·3332
定 价 38.00 元

目 录

中国道路与道路自信·····	李主斌	001
中国道路的历史考察·····	瞿 骏 王 锐	016
现代性的中国方案及其世界意义·····	胡绪明	02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研判依据·····	宫维明	038
新时代坚持和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解析·····	陆 夏	050
如何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城市建党的基本经验		
——以新中国成立前中共上海电话公司支部为例 ···	李威利	061
政党与文化反腐：中国反腐的新经验与新趋势 ·····	冯 莉	080
新生社会空间中的党组织——一种“社会中的政党”的		
研究路径·····	唐文玉	094
政党组织社会：中国式社会治理创新之道 ·····	叶 敏	114
土地改革与农村治理：浅析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社会		
组织形态的跃迁·····	吴 超	127

20 世纪 50 年代婚制变革中的身份之困	满 永	13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创新思想探析	万立明	163
乡村空心化背景下的文化失落及其振兴机制 ——以鲁西南 J 村为典型个案的研究	秦 文	183
基于动漫文化的中国精神之弘扬	周 霞	196
积极心理视域下培育大学生的信心、信念、信仰	杨秀君	213
中国的新疆域外交和全球治理话语权建设	赵 隆	222
后记		246

中国道路与道路自信

李主斌

一、引言

自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均 GDP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不到 300 美元提高到 2017 年的 8 800 美元,GDP 总量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据测算,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 30% 以上。经济的腾飞也为我国在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从世界范围来讲,自工业革命发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就从世界发展中脱颖而出,并通过殖民主义的方式向全世界推广其发展模式与价值观念。自此以后,其他国家就一直处于学习、追赶西方社会的过程中。但是,至今为止,大部分后进国家不仅未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差距越拉越大。当然,也有一些成功缩小甚至赶上发达国家的国家或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等。现在,中国大陆也成功了。一个历史事实是,发达国家对待中国之发展的态度与对待日本、韩国等国家或地区之发展的态度迥然有异,这种差异客观上造成了中国道路独特的世界意义。这一点正如俄罗斯著名学者弗拉基米尔·波波夫所评论的:

这种发展并非没有先例;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几

个主要基于中国传统的国家和地区,确保了传统价值并成功实现了对西方的赶超。毫无疑问,中国的成功赶超将会对世界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这首先是因为,先前所有的成功赶超基本上全部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这种赶超甚至被冠以“邀请式发展”(development by invitation)的名号;但中国的崛起从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被邀请的结果。其次,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中国的成功赶超就不能再以特殊性或例外来解释;一旦中国获得成功,就会成为制度承继优势最根本的和最有说服力的证据。^①

换言之,中国道路的成功表明了,一种迥异于西方发展模式的新的发展模式是有可能成功的。西方模式并非发展中国家走向成功的唯一道路。

当然,这个论点要能够成立,还依赖于我们对如下问题的肯定回答: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中国奇迹是否会继续上演?显然,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回答如下问题,即:在短短的不过40年的时间里,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这实际上是问我们如何理解中国道路,或者说,中国道路迥异于西方道路的独特性在哪里。在给出这一问题的答案后,前一个问题就自动转变为:中国道路的那些独有的特征在未来的岁月是否会继续发挥作用?当前,这些问题已经引起全世界学者的关注,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当然,尽管探讨中国道路成功的文献非常多,但大部分集中在经济领域,即就经济言经济,然而,也有不少学者尝试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如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等方面)中来谈论中国道路的成功。本文的目的是尝试梳理一下这方面的论述,并作一些粗浅的思考。

此外,我们注意到,中共十八大报告曾提出三个自信,道路自信是其中之一。显然,中国道路与道路自信是两个密切关联的概念;或

^① 弗拉基米尔·波波夫:《广阔视野下的中俄转型比较》,《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期。

许我们可以这样讲,道路自信建立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继续取得成功的信念上。这也是本文写作的一个初衷。

二、道路自信的源泉是什么?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在四个自信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文化自信,并认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通常认为,中国道路包含狭义和广义两种内涵。狭义的中国道路主要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具体路径。至于广义的中国道路,李慎明等学者认为,它包括“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之路”^①,陈晋则认为,它是途径、理论和制度三种形态在实践中的有机统一,换言之,广义的中国道路不仅包括这一具体路径,还包括与之相配的制度、理论和文化。^②既然中国道路有广义与狭义之区分,那么,当我们谈论“道路自信”时,就应该清楚自己谈论的是何种意义上的中国道路,因为对于不同含义的中国道路其道路自信的来源可能迥然不同。

就广义的中国道路来说,对它的自信由于包含着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又更基础,因此文化自信的树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道路自信的树立。文化自信的源泉是什么?一般地看,至少人们可以基于如下两点确立起文化自信:其一是基于现实的,即对于本国文化走出国门,获得他国人民喜爱,并进而影响他国人民情感、认识的能力报以乐观的态度,或者对本国文化在各国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中能够拥有自己的位置报以乐观的态度;其二是基于

① 李慎明、何成、宋维强:《“中国道路”的六个内涵》,《科学咨询》(科技·管理)2011年第2期。

② 陈晋:《关于中国道路的几个认识》,《党的文献》2013年第2期。

历史的,即对本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报以乐观的态度。今天,我们的文化走出国门的能力暂时有限,在这一点上,我们甚至比不上日本、韩国,因此,我们很难基于第一点确立起文化自信。但是,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而且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延续至今的国度,我们的祖先创造了极其瑰丽灿烂的民族文化。就此而言,我们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有完全的自信。

那么,我们能否基于第二种源泉所确立的文化自信来确立道路自信?对此,本文持怀疑态度,因为基于第二种源泉所确立的文化自信如果没有基于第一种源泉所确立的文化自信的加持,那么所确立的自信就会类似于帕斯卡尔所论述的人的高贵:

思想形成人的伟大。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①

尽管现实中诸多动物、生物比人更强大,但会思想这一特质赋予了人在面对其他一切东西时尊贵的感觉;类似的,尽管中国的传统文化在面对现代西方流行文化时没有赋予我们“枪与炮”,但它的璀璨、它的光辉足以给予我们足够的自豪感、自尊心。道路自信的基础是中国道路过去取得了成功,并将继续取得成功。所以,如果关于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如果可以支撑道路自信,那么它一定是在如下意义上而言的:传统文化不仅仅给我们自豪感、自尊心,它还支持了中国道路在过去取得的成功,并且将继续支持中国道路取得成功。

但是,这里所讨论的道路自信实际上已经是对于狭义的中国道路的自信了。如前所述,狭义的中国道路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① [法]帕斯卡尔:《思想录——论宗教和其他主题的思想》,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7—158页。

道路,即始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走的道路。众所周知,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我国从“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一度濒临崩溃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与第一名的差距越来越小,与第三名的差距越来越大。与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对应,我国在科学技术、社会建设等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就此而言,我们对我国过去四十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充满自信,对我们走的道路也充满自信。可以说,对于狭义的中国道路之自信,是因为这样一条道路所表现出来的“力”:它在经济、政治、科技、民生等一系列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所带来的好处。

所以,我们有必要就狭义的中国道路探讨其道路自信的源泉。直观上看,仅当我们能确信如下两点时,我们才能确立起这样的道路自信:其一,在过去的四十年,我国所取得的成绩并不仅仅是因为采用了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手段,即市场经济,或者说,实行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所取得的成功,因为如果我国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那么中国道路就不过是西方道路的一个具体事例,中国道路之为中国道路的理由不再存在。就此而言,我们有必要探寻我国取得巨大成功背后的一些独有的东西,而且这些独有的东西实际上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取得巨大发展的秘密武器。即是说,我们首先要确定,确实存在着所谓的“中国道路”,这一提法并不仅仅是一个提法而已。其二,在未来,中国道路会继续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功。仅当中国道路不仅仅是过去取得了成功,未来还将继续成功时,我们才能完全确立起道路自信。那么,对未来成功的自信如何确立?这当然首先依赖于我们对于中国道路核心特质,或者说过去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只有当搞清楚了这一个问题后,我们才能够判断这些因素在未来可变化的环境中是否还能够起作用,以及将如何起作用。搞清楚了这些,我们才有可能确立起道路自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除非能够确立传统文化在中国过去四十年所取得的成绩中扮演重要角色,否则,基于璀璨的传统文化所确立起

来的文化自信不能有助于我们树立起对于狭义的中国道路之道路自信,从而也就不能确立起对广义中国道路的道路自信。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以为,即使谈论广义的中国道路以及对于这一道路的道路自信可能是有价值的,但讨论狭义的中国道路之道路自信更有实质性内容,也更有助于帮助我们树立对国家、对党的信心。因此,在这篇文章中,当我们谈论“中国道路”时,将仅在狭义的意义使用这一个词。

三、中国道路成功的诸要素

什么是中国道路?或者说,中国在过去四十年取得如此成绩的秘密武器是什么?由于我国取得的巨大成绩首先表现为经济上的巨大成绩,然后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各个其他领域的成绩,如军事实力、科学技术等,因此,探讨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是探讨中国道路的首要任务,并且因此从经济领域去探讨也即成了一个顺其自然的做法。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仅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它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就此而言,市场经济恐怕不能完全支撑我国所取得的经济奇迹。关于这一点,有两个比较可以来佐证。其一,在当今世界,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为主臬的国家数量庞大,但取得成功的却仅有几个国家或地区,大部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增大。所以,如果市场经济是经济快速发展的良药,那么,这些国家为什么没有成功就难以得到解释。其二,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没有成功,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却成功了。如果从一系列的数据来看,那么是苏联而不是中国更能够成功。例如,苏联的工业化、现代化程度都比中国要高出很多;苏联当时的厂长经理文化水平普遍是大学本科以上,而中国的厂长经理平均水平是高中肄业;苏联更早地实行经济改革,而中国则是

在“文革”后才启动改革；苏联的改革是把西方取得巨大成功的市场经济照搬过去，而中国的改革则不被西方所“看懂”；……^①结果，苏联的改革失败了，中国的则取得了成功。为什么会如此？显然，无论我们提出何种解释，这一解释肯定不会是唯市场经济论的。

当然，毫无疑问，实行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被搞活并进而腾飞的基本要素，但是，缺乏一系列中国拥有而其他国家没有或者抛弃的因素，市场经济自身并不能发挥如此巨大的威力。那么，哪些因素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呢？

一个被诸多论者注意到的因素是传统与继承。长期以来，国内有一种论述，这一论述以1978年为界把新中国分成两个部分，并且隐隐地将这两部分对立起来，似乎只有否定前三十年才能解释后面的改革成功。这一做法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在《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中，甘阳详细探讨了新中国前三十年为后面的改革成功所奠定的一些基础，其探讨策略是中苏比较。如前所述，苏联在工业基础等诸方面要优于当时的中国，为什么苏联经济改革失败了，而中国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样是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什么结果截然相反？甘阳认为，邓小平改革的成功是建立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地方分权化”的基础上，而这一基础恰恰是苏联所缺失的。苏联的经济改革是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通过把权限下放到国有企业搞市场经济。权限下放意味着给国有企业发展的自主权，同时意味着原有的一套方案被抛弃，但是国有企业改革由于涉及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难度非常大，因而国企改革失败，苏联也垮掉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很难说是因为国企改革的成功，但由于我们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的飞速发展，盘活了经济建设的整盘棋，因而我们的改革取得了成功。这一现象是怎么发生的？甘阳认为，它源于毛泽东时期形成的“地方分权化”。

^① 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读书》2007年第6期。

苏联经济是典型的中央计划经济,但是中国从 50 年代末开始就不断地把工厂的管理权限移除中央部委的管辖范围,把它们交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尽管 1961 年所有的经济权曾一度收回中央,但毛泽东在 1964 年又把经济权下放给地方,明确反对一切由中央管辖。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中国实行的从来不是一个苏联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体制。例如,中国在计划性最高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 600 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 5 500 种。1978 年,苏联一共只有 4 万个企业,但规模都很大,而中国却有 348 000 个企业,其中仅有 4 000 个规模比较大,其余都是中小企业,多数甚至都不是省级企业而是地县以至乡镇管理的企业。^①由于毛泽东时期的地方分权化,中国经济体制是多层次、区域化和地方化的。正是这一特点为乡镇企业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这种描述是正确的,但它所侧重的是新中国的头三十年所留给后来的遗产,而不是侧重于改革开放对传统的继承,而且它是“在经济言经济”。我们需要更广的视野。弗拉基米尔·波波夫曾论到,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发展的一个困境是如何走出人口增长快于生产增长的“马尔萨斯陷阱”:

导致“马尔萨斯增长陷阱”的原因是从低收入人口中汲取储蓄能力不足。储蓄与投资的不足无法提高资本—劳动比率,因为居高不下的口增长率致使所有投资都用于为新增人口创造工作岗位,资本—劳动比率提升再无空间。此外,口增长率取决于人均产出的生产率;所以当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率时,口增长率就会增加,从而将技术进步推动的生产率提高全部侵蚀。^②

因此,打破马尔萨斯循环的尝试必然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和对人口

① 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读书》2007 年第 6 期。

② 弗拉基米尔·波波夫:《广阔视野下的中俄转型比较》,《国外理论动态》2011 年第 1 期。

增长的抑制,但是在生产率较为低下时,人口增长对于维持一个国家的军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即是说,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的前提条件是:“在两到三个世纪收入不平等不断扩大的大规模社会重构之中,既没有弱势群体的暴乱也没有遭遇外敌的入侵。^①”古希腊、罗马、拜占庭都没有这样的幸运,只有16至19世纪的西北欧巧遇了这一机会。英国以及之后的其他西方国家能够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向现代增长转型,是因为它们终结了整体主义制度,通过扩大收入不平等增加储蓄与投资,使资本积累得以超越人口增长,提高资本—劳动比率。所付出的代价是,扩大的收入不平等、表现为高谋杀率的制度能力削弱以及预期寿命下降。

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殖民主义把其发展模式带到发展中国家时,处于低收入水平时期的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制度体系被毁坏了,其制度发展轨迹被打断,其制度能力被削弱,由此不可避免地对这些国家经济增长形成负面影响。与此相对,中国由于保持了传统制度体系,并且在前工业革命时期就已经取得骄人的成绩。如前所述,在前工业革命时期,人口增长是社会发展的最重要指标,在这一点上,中国是当时全世界最成功的国家:从公元元年到1500年,中国人口增长到比西欧人口多两倍以上;到1820年,中国人口已比西欧人口多3倍以上。尽管耻辱的两次鸦片战争打断了中国这一缓慢发展的进程,但中国并没有因此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殖民地,传统的制度体系依然得以保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赶超式发展同样令人影响深刻,这不仅仅表现在于1979年改革之后的强于其他地区的高速经济增长,即使在改革之前,除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短暂下滑,中国的发展也是十分成功的。^②

就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转型而言,弗拉基米尔·波波夫同样认

①② 弗拉基米尔·波波夫:《广阔视野下的中俄转型比较》,《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期。

为,其成功不仅仅依赖于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导向的改革,毛泽东执掌中国时的成就已经给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始于1979年的经济自由化只是赤壁之战中的东风;促进中国成功的其他要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强大的制度体系和充足的人力资本在毛泽东时代已经准备就绪。”^①其一,中国1979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加速,是因为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几个世纪以来最高效率的政府。深入到村落的党组织能使党的政策能有效、迅速地贯彻到全国各地;毛泽东留给邓小平的中央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达到20%,远高于国民党政权的5%,甚至高于明治维新后日本的12%;中国的犯罪率在20世纪70年代处于世界最低水平,影子经济几乎不存在;1985年“透明国际”声称中国是腐败程度最低的发展中国家;经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世界史上最伟大的大众教育实验”之后,中国的识字率由1949年的28%提高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65%,而此时印度的识字率为41%。其二,关于充足的人力资本,国内学者已经有充分的论述,并通常冠以“人口红利”的称呼。按照前面关于前工业革命时期世界发展的描述,我们也可以看到,充足的人力资本本身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

由上述论述可以看到,对传统的继承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性;我国的改革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很大意义上也是因为我们的传统制度体系被继承了,而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未能赶上西方则部分是由于它们的传统制度体系被毁坏。但是,由于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成功也具有继承传统这一特征,因此它不能完全说明中国道路的特点。中国道路还有一些其他的特征,那些特征是什么?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经济上自由化,而政治改革

① 弗拉基米尔·波波夫:《广阔视野下的中俄转型比较》,《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期。

自1990年以后就停滞不前或趋于保守。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功劳,甚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阻碍了经济的快速发展。陈红太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与趋势》一文中挑战了这一观点: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中国模式问题,我认为揭示中国发展奇迹的密码不在经济领域。有人说正因为中国搞了市场经济和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这样看问题只是看到了中国奇迹的表象和起因,没有深入到中国奇迹的内在逻辑。从比较的视野,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搞了市场和开放型经济,为什么没有取得中国这样的奇迹?所以,解读中国奇迹的密码应到政治领域中寻找。中国政治文化有“四大优势”:“集中效率优势”、“政治组织优势”、“制度创新优势”、“文化包容优势”。这“四大优势”是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所没有的,也是中国发展奇迹的奥妙之所在。^①

从论证的角度看,这一段论述所基于的前提(即中国奇迹的密码不在经济领域就在政治领域中)缺乏支持,就此而言,这里的立论未免有失偏颇。但是,文中所要正面论述的中国政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则值得我们注意。即是说,在陈红太看来,中国发展之奇迹的秘密在于政治领域的四个优势。陈红太没有一一分析这四个优势,但他提供了一个更宏观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以1989年为界分两段,第一阶段以改革权力过于集中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为内容,第二阶段相比于第一阶段则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确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实质上是把维护政治社会稳定突出地提了出来,从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②换言之,自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命题后,我国政治

①② 陈红太:《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和趋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3期。

体制的改革就完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是为经济发展而服务的。如果注意到了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那么就能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在政治领域改革这样一个思路对中国奇迹的产生有多么重要的作用。根据一种理论(即现代化理论),发展中国家只要加速经济发展,同时促进政治民主化,就能和西方社会一样,进入经济发达、政治民主的“现代化”社会。但是,亨廷顿认为,政治秩序并不能从现代化的过程中自动产生,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因为经济发展会造成原本处于政治之外的社会阶层获得参与政治的要求和能力,这通常会与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参与方面不健全的制度构成矛盾,从而容易导致“制度过载”,其结果就是政治动荡和不稳定,甚至政治崩溃。所以,没有政治秩序,不管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都不可能成功进行,因此首要的是政治权威提供政治秩序,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条件。就此而言,我国第二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把维护政治社会稳定作为目标之一,实际上就是在提供这样的政治秩序。如果如亨廷顿所言,政治秩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那么中国这一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中国奇迹产生的基本条件。

不仅如此,陈红太的论述还提到另一个方面,即政治体制改革是为经济服务。尽管他没有给出具体的例子,但我们很容易脑补这一点。例如,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GDP这一指标在地方官员的考核中很长时间居于首要地位。其结果是,地方政府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裁判者、服务者,它本身也是参与者。作为参与者,它会思考如何能够更多地招商引资以发展本地经济,并把相关的想法付诸实践。这种做法当然导致了一系列弊端(如野蛮拆迁、刚性维稳等),但是在国有企业改革没有取得明显实效的时候,地方经济之所以能活跃起来并带动国有企业改革,不能不说这一考核方式居功至伟。如前面所论述的,地方经济盘活实际上是中国奇迹的起点和关键;没有地方经济,我们很可能如苏联一样陷入崩溃。显然,这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因为这种做法在西方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是不可思议的,但它却非